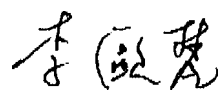


與兩者的淵源頗深。我的研究偏於實證一路，主要是對中國改革實踐進行調查與研究，並以批判性態度評點中國的改革。在90年代初期，國內根本沒有任何雜誌可以發表這些文章，是《二十一世紀》雜誌給我提供了陣地，讓這些文章以最快的速度與學術界同仁見面，使大家可以從另一個側面了解到中國的改革進程。我相信，《二十一世紀》的老作者與老讀者都不會忘記，拙著《中國的陷阱》（即《現代化的陷阱》）的不少重要章節的主要內容都相繼發表於這本雜誌上。無論是作為讀者還是作者，我都對《二十一世紀》雜誌心存感謝。

值《二十一世紀》十周年華誕，我想表達一點小小的心願：希望其一如開辦時的初衷，直面現實與歷史，常發厚重之論，成為中國思想界的重要公共論壇。如果能讓我們在這一公共論壇上探測到二十世紀末與二十一世紀中國重要的思想軌迹，則為中國知識界之幸，也是新老作者與讀者之幸。唯其如此，這本雜誌才會被中國思想界繼續目為「我們自己的雜誌」。

何清漣 現於深圳從事學術研究，為自由撰稿人。

## 知識份子和網路文化



二十一世紀是網路文化的時代，知識份子上網在所必然。我覺得目前中國知識份子在網站上的你爭我奪，較30年代的《申報》「自由談」尤有過之，其後果不問自知。這個新的空間得來不易，如果不加珍惜，必將導致知識份子本身和其影響力的沒落。

二十一世紀終到來，今年也是《二十一世紀》出版的十周年，值此佳慶時節，我不禁想起《二十一世紀》在二十一世紀即將面臨的挑戰，和《二十一世紀》最關心的題目——中國知識份子——在二十一世紀所扮演的角色問題。



李歐梵(中)與金耀基(左)、勞思光(右)在中國文化研究所休息室交談。

眾所周知，二十一世紀是網路文化的時代，知識份子上網在所必然。然而，知識和網路的關係究竟如何？網路所帶來的大量訊息如何選擇？如何消化？知識份子自設網站，是否又將扮演另一種啟蒙的角色？然而這種經電子媒體中介而製造的「啟蒙運動」，是否會使知識變質，或將知識立即轉化為權力？網路是否會變成爭奪文化霸權的空間？或是可以構成一種新的「公共領域」？這種「公共性」和民主的建構有何關係？它所提供的「共時性」是否可以促進多種意見和聲音的表達？而「眾聲喧嘩」的結果是導致自由討論的空間擴大還是縮小？這一連串的問題，顯而易見，至今卻不見有人深思反省，徹底探討從印刷文化轉向電子網路文化後的問題。

多年前我曾在《二十一世紀》發表過一篇論文，談到上海《申報》的「自由談」欄目，從晚清到民國時代究竟提供了多大的批評的空間。我得到的結論使我自己也感到驚異：民國初年的「自由談」的確提供了一點批評時政的園地，但參加討論的人反而不是當時有名的知識份子，而是半新不舊的上海文人。到了30年代，《申報》的「自由談」由於魯迅的雜文更加著名，但卻反而因為魯迅帶頭的譏諷文風，而無法形成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謂的「公共領域」，變成了魯迅所謂的「偽自由空間」。

且不論我這個論證是否令人信服，我覺得目前中國知識份子在網站上的你爭我奪，較30年代的《申報》「自由談」尤有過之，其後果不問自知。這個新的空間得來不易，如果不加珍惜，必將導致知識份子本身和其影響力的沒落。

李歐梵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教授